

就地城镇化下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

张卫国^{1,2},汪小钗¹,黄晓兰¹

(1.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044;2.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村落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珍贵遗产,我国迁移式城镇化模式导致了大量村落的衰落,就地城镇化模式为村落复兴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村落复兴该如何理解?在就地城镇化下又该如何评估村落复兴程度?为此,本文运用生态学原理解读了村落衰退的原因与过程,分析村落复兴的重要影响因素,探讨村落复兴与就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切入,提出就地城镇化下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村落复兴程度提供一个测度依据。

关键词:村落复兴;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生态恢复;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057-09

复兴,即衰落后再兴盛起来。村落的复兴就是将衰落的村落重新发展起来,包括对缺损的村落系统部分的修复,对缺失的村落系统功能结构完善以及对自组织能力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恢复,最终要使村落达到结构完整,功能完善,自组织良好的状态。本文更强调的是对村落个体的修复,而非宏观上的潮流复兴。

随着迁移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流向城镇,乡村人口锐减,而留在乡村的大部分是儿童、妇女和老人,乡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人口的缺失,使很多村落失去发展活力,甚至有些村落就此悄无声息地消亡。

村落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而在我国,迁移式城镇化模式导致了大量村落的衰落。据统计,2000年我国自然村落总数363万个,到2010年锐减至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万个^[1]。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里,我国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减为64万多个,每年减少1.8万个村落,每天约减少50个^[2],为此,李培林曾在文中怅然慨叹:一座座城市兴起的欢呼背后是许多村落消逝的落寞。城市里车水马龙,农民工在艰辛地寻求生存,而村落里昔日的喧闹却逐渐消失。

城镇化应当伴随着的是农民的喜悦,是家乡的富裕,是村落的兴盛。然而,还没走到终端,我们已经看到了村落的颓败。于是,有人开始慨叹,归去来兮^[3];有人开始惶惑,村落不在,暮年何在^[4];有人开始呼唤保护村落,留住乡愁^[5]。

村落及村落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主要载体,村落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6],保护传统村落,传承村落文化对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村落作为

收稿日期:2016-01-23

作者简介:张卫国,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战略选择”(12&·ZD100),项目负责人:张卫国。

农业生产的基层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状态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村落文化是村落发展的凝聚力体现,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有利于村落发展,而村落发展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村落文化的传承与演化,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村落体系的发展。

村落复兴以及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刻不容缓,就地城镇化为村落的复兴带来新的思路。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村落复兴之路依旧曲折。近几年来,有些村落诚然得以复兴,但更多的村落及其文化传承走向失落或者在村落复兴过程中过于重视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最终经济得以发展,而村落本土文化却在村落崛起的路上走失了;或者是盲目地追求复古,追求“原生态”,致使村落的发展始终深陷泥沼。尤其是近些年,古村古镇频频出现,但是反响比较好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在被人们认识之前就没落或者面目全非。那么,村落复兴当以何为指导?村落复兴的水平该如何评估?本文分析了村落复兴与就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就地城镇化与村落复兴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分析村落系统构成,提出就地城镇化下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为村落复兴程度提供一个测度依据,既不放弃村落的崛起,也不忽视对村落文化的传承,为以后的村落复兴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一、构建依据

(一)村落复兴

1982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受到广泛关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涉及到历史村镇的保护。从此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序幕。

我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历程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国内对于传统村落的关注比较少。80年代初,阮仪兰教授主持开展了江南水乡的调研及保护规划活动,发起了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活动。

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逐渐重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这一时期更侧重的是对传统村落的聚落景观、乡土建筑等方面入手的研究。90年代末,一些历史风貌保存较为完好的村镇相继受到关注和保护,其中地理学专家们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至今,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典型村落研究逐渐走向一般,从注重村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深入到村落内在机制和变化机理,同时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以2002年历史文化村镇概念法律化及保护规定的明确为分水岭,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进入全新阶段。2002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并确立了其在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并于2003年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村,2004年出台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试行)。2005年9月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村落保护关系受到关注。2006年11月传统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问题被正式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留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成为热点议题。2007年,明确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将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归入城市总体规划。2008年《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并开始执行,传统村镇保护有了法律保障。

从2003年第一批历史文化村评选出炉,及至今日,已经有六批历史名村被公布,对于传统村落的关注已经从对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视提升和扩散到对传统村落这一整体文化载体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观念、措施及相关研究也一直发生着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

1.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即在对传统村落文化及载体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发展。这一时期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努力完善传统村镇的历史文化保存机制,争取达到传统村落标准,因此这一时期的传统村落保护有明确的目的性,并且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保护过程中,强调“原汁原味”,从人到建筑基本维持村镇原始的样子。相当一部分文献都以承载了历史文化的典型村落为研究对象,研究村落的衰败原因并提出建议或建设规划。对于传统村落的发展,一般以旅游业(例如“农家乐”等)为主,寄希望于走文化旅游之路,方法比较单一,且仅适合于历史文化浓郁的传统村

镇。诚然,部分村镇依靠这类方法获得了成功,但是也有很多村落并未因为拼入历史文化名镇/村而获得发展。事实上,很多村镇在“上名单”后依旧无人问津。而村落复兴面对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浓郁的有名村镇,而是普遍性的传统村落这个承载了村落文化的全体,是在已经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发展的基础上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挖掘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及人文价值,从而达到村落的普遍性恢复与发展。村落复兴继承和传承的主要是村落文化,并不一味地只强调居民的“原汁原味”,而是鼓励传统村落与外界交流(包括信息及人、财、物的交换),通过建立自己的特色产品开拓特色市场来发展传统村落的经济,换言之,在保护的基础上,村落复兴更强调村落发展。

2. 传统村落的利用与产业复兴,即充分利用传统村落的优势资源进行产业复兴,从而推动传统村落的发展。这一阶段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关于发展传统村落相关产业的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规划或研究较为常见。传统村落产业复兴对于村落复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传统村落的利用与复兴是村落复兴的重要环节。传统村落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特点鲜明,应根据村落的属性进行分类,采取不同的发展途径,因地制宜地解决传承和发展问题。

传统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村落复兴则要求在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的同时还要发展传统村落的经济与文化。可以说,传统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村落复兴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村落的复兴就是要将衰落的村落重新发展起来,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先要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和发展,然后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内在潜力,推动产业复苏,从而带动传统村落复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加强居民的主人意识,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严密保护,防止村落文化的佚失。截至今日,我国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已经由典型历史文化村落渐渐扩大转向至传统村落这一大的整体。对于传统村落复兴的思考已经逐渐浮出水面,村落保护的一个崭新阶段又将开启。如同在典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时期需要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引导历史文化村落的发展方向一样,在这样一个崭新时期,我们也需要制定一个类似的标杆,为村落复兴提供方向参考。

(二)就地城镇化与村落复兴

就地城镇化是指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民在原居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实现非农就业,并不断完善当地乡村公共设施、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变生活方式等,逐步形成新城镇的城镇化模式^[7]。

随着经济发展,在城市逐渐扩张的同时,乡村非农活动也日益发达。很多城市设施也逐渐普及到了乡村,原有的乡村与城市的划分界限越来越趋于模糊。迁移式城镇化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政府现阶段正在强调缩小城乡差距,完全地将乡村劳动力资源迁移到城市的城镇化模式,显然有悖于城乡拉力;另一方面,固然有户籍制度等原因限制了人口迁移的过程,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文化的力量——几千年来,人们对于“家”的执念,对于“家乡”的眷恋从来没有熄灭过。一旦能在家乡附近实现非农化就业,达到满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很多人就不会选择迁移。事实上,通过对我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祁新华和朱宇等^[8]发现这三个地区并非以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模式实现城镇化,而是实现了转型的就地城镇化。国际上也并不缺乏成功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如印度、巴基斯坦、荷兰等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例子),并且这样的案例还在继续增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城镇化工作组也对就地城镇化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专著^[9]。

与迁移式城镇化方式相比,就地城镇化具有以下优点:第一,由于就地城镇化是在原有乡村的基础上发展,故就当地而言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没有了城乡差距扩大的顾虑,减小了村落人口流失的势差;第二,由于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对村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会同步提高,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在不离开家乡的情况下就能够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乡村居民也就同步实现了人的城镇化,改善人居环境同时,也增大了村落留住劳动力的

吸引力;第三,就地城镇化过程必然需要产业的支持,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带动村落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益外溢较大的作物生产效率将得到恢复甚至提升,相关产业链可以得到修复和提升,同时,部分村落所选择的主要发展产业是以村落文化或景观为主题,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村落文化的发展和扩散;第四,就地城镇化能够保留村落及其居民原有的文化及品格,并且原有村落的“盘活”能够进一步促进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村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村落文化的发展增加活力;第五,村级基层组织可以在此过程中得到修复和完善,基层公共权威可以得到恢复,村落治理失序现象能够得到改善,有利于村落发展^[10]。然而,就地城镇化对村落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隐忧,例如外界与村落信息物质交流速度加快。若外界干扰力过强,当地村落盲目跟风,很可能导致本土村落文化的失落,近年来许多传统村落向成功案例“学习”,纷纷进行商业化,于是,如同孪生的各种古村古镇出现在世人面前,千篇一律,传统村落的文化底蕴消弭无形,只剩下现代商业化的浮华;还有的村落以开发旅游业为主,过度地人流涌进,给村落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环境恶化日益明显。显而易见,就地城镇化于村落复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在制定评价村落复兴的过程中既会考虑就地城镇化带来的诸多好处,也会考虑其对村落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三)生态恢复与村落复兴

生态恢复的概念源于生态工程或生物技术,是恢复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退化生态系统,对生态恢复的理解和定义说法不一。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生态恢复是使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恢复到受干扰前状态的过程^[11];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恢复是重建某区域历史上有的植物和动物群落,而且保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传统文化功能的持续性的过程^[12]。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对生态恢复有过三次定义,最终认为生态恢复是帮助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的科学,生态整合性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和结构、区域及历史情况、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等广泛的范围^[13]。国内也不乏对生态恢复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恢复主要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技术与方法、生态学过程与机理,主要目的是通过改良和重建退化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其生物学潜力^[14]。

纵观学者们对于生态恢复的定义和见解,可以发现有的强调恢复的结果,即强调受损的生态系统要恢复到理想状态;有的强调恢复过程中应用生态学的过程,重视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及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技术与方法、过程与机理^[15];还有一部分观点则强调生态整合性恢复^[13]。但是无论哪种定义都认可生态恢复的对象为受损的生态系统,即生态恢复发生的充要条件是存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曾经能够达到系统的动态均衡,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外力干扰或者突发因素影响,系统均衡被破坏,生态系统受到损害。以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为阈值,当损害程度小于此值时,生态系统能够“自愈”;当损害程度大于此值时,生态系统将无法完全依靠自我调节维持系统稳定,长此以往,生态系统很可能濒临崩溃。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村落系统曾经实现了系统的动态均衡;在迁移式城镇化发展初期,部分人口开始流向城市,村落系统均衡出现动摇,然而依旧在其承受范围内;步入城镇化发展第四阶段以后,农民工大量进入城镇,村落体系损伤开始加重,逐渐超出阈值,村落开始出现严重衰退现象。

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将借鉴生态学的概念对村落结构进行解析,同时分析村落衰落的原因以及恢复的关键,这是应用生态学的过程。在评价村落复兴水平时,我们将对村落系统多样性、村落系统功能结构完整性、可持续性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二、村落系统构成及功能结构

村落是中国农耕时代,依附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形成,并随着自然环境的演化和人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发展不断碰撞融合,发展演化至今的有机生态系统。村落中除了自然生态系统外,还存在以人为主体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为了便于分析其组成成分,文本借鉴前人的观点,借用生态学中

关于生态系统的概念。

本文将村落成分划分为以下几部分(如图 1 所示):村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人和村落实体;村落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村落文明,即在村落存在的基础上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村落意识表达,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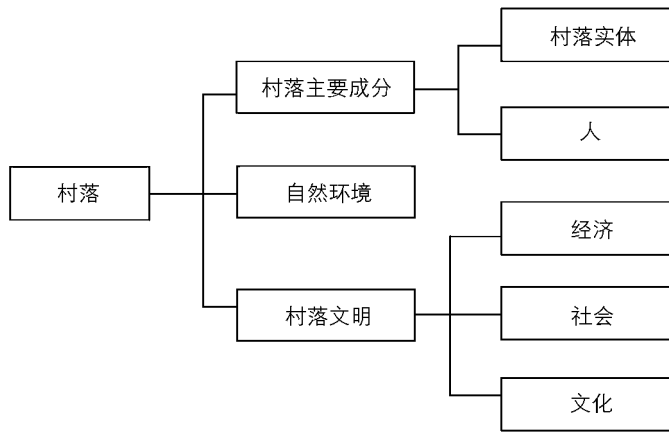


图 1 村落系统构成

正如冯淑华^[16]所说,村落是特殊而完整的人类生产、生活、居住的系统。村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村落里的人以及村落实体。其中人是主体因子,一方面,人类占据了村落的大部分资源,对村落的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类在村落系统的内能量转换、流动和积累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在保证村落系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着关键的作用。村落里的人不仅仅包含村落本身的居民,还包括游客以及外来人口。村落实体是指村落中除自然地理环境以外的组成部分,包括街道房屋建筑,以及为了维持生存所制造的人工生态系统(比如农田、鱼塘、耕地等等)和基础设施。村落实体依托于自然环境,由人建设而成,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建筑与设施,能够转化自然资源为人所用。归根结底,村落实体是人与自然共同合作的杰作,既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也承载了建造者的思想理念。从土青砖木架构造的山水诗意到混凝土钢筋筑造的现代浮华,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风格无不显露在默默承载人们生活的建筑里。村落实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其建设者所在时代的精神风貌的折射。

适宜的自然环境是村落生存和发展的本源支撑。村落依托的自然环境包括村落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等等。自然环境为村落实体的建设提供依托,对村落实体的建设提供资源,也限制其建筑功能与风格。同时,它也会对村落的主体——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影响到整个村落的人文风格、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村落自身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村落中人的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无数次印证,如何修复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已经是当今社会的重大课题。

除此之外人的活动,尤其是对满足自身需求(如物质和精神的追求),给村落带来了许多附加价值,本文将这些人类活动给村落带来的延伸看作村落文明,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人在追求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时传承或创造了它们,反过来,村落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也对人的发展造成影响。尤其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村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在更高层面决定了村落实体的特色,也决定了村落的内聚性,是村落发展的原动力。

综上所述,村落系统是由人、村落实体、自然环境和村落文明相互结合构成的有机系统,该系统具有完整的内部功能结构,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物质循环结构和能量流动路线(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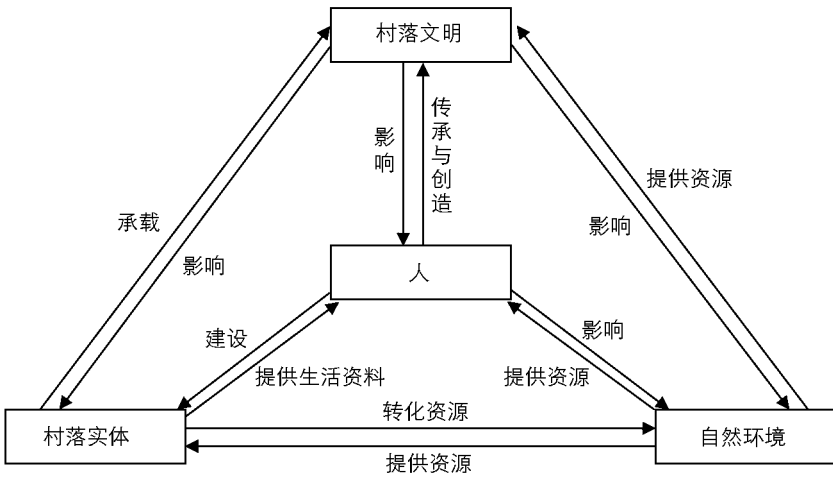


图2 村落系统内部功能结构及能量流动

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村落系统也具有开放性(如图3所示)。外部系统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都会对村落系统造成影响。外部系统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与村落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彼此间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从未停止过,外部自然环境发生巨变必然会对村落系统造成影响。外部还可以通过对影响人类活动和文化嬗动的方式对村落系统造成干扰。

与自然生态系统稳态的描述类似,对村落稳态的描述是村落系统主动对外部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外部系统进行碰撞与适应,并不断对内部系统进行整合,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动态自组织结构^[17]。

村落的发展与演化并不仅仅是自身发展在推动或者被动接受外部系统的影响而导致的,而是在内部和外部作用力下相互适应,互动发展的合力下进行的调适过程。

但是,当外部系统对村落系统的干扰超过村落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时,村落开始出现退化。近年来,随着快速城镇化模式的推进,出现大量村落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村落系统的主体因子缺损,系统多样性受损,村落系统内部运行的动力出现不足。这不仅仅会直接导致村落系统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出现障碍,村落实体和村落文明发生退化,还会降低村落系统的调节能力,导致村落系统对外部组织的抵抗能力与适应能力降低,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村落将逐渐走向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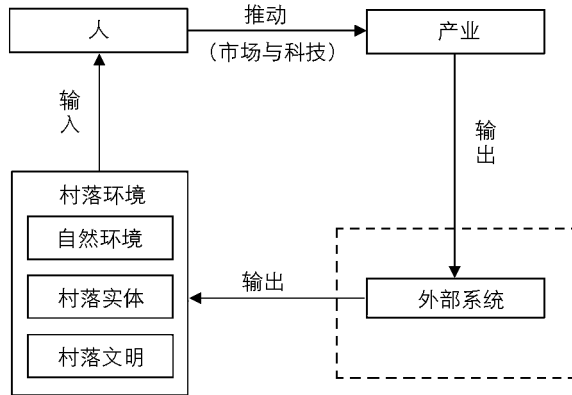


图3 开放型村落系统能量流动

村落的复兴就是将缺损的村落系统部分修复,恢复村落系统主体因子的多样性,完善缺失的村落系统功能结构,恢复村落系统的自组织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最终要使村落达到结构完整,功能完善,自组织良好的状态。

三、指标设计

指标设计将结合系统论观点,以村落系统的组成要素为基本维度,以反映村落系统发展成果的指标和结构及功能恢复的指标为指标选择的参考范围,以要素投入、结构水平、支撑条件和功能绩效为指标选取依据,结合前人相关指标设计研究成果,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对村落系统修复水平、功能结构完善程度进行评价指标设定。

对村落系统主体的恢复既要保证人口数量的增加,也要保证系统主体多样性的恢复。对于前者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来度量村落基本人口的数量恢复水平,以流动人口增长率来度量主体因子活性的恢复,以常住人口性别比和常住人口 20~60 岁人口占比共同描述系统主体因子多样性的恢复程度,其中前者是性别的多样性测度,不仅是对年龄阶段多样性水平的评估,更是对以前村落系统大量流失的主体因子部分的恢复水平的测度。

对村落实体的修复与建设不仅要保证其功能的恢复程度,还要注重原村落实体所承载的文化因子的保留程度。就地城镇化下的村落恢复,不仅是纯粹地强调城镇化,还要保证村落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与发展。作为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的村落建筑,不能简单粗暴地随着城镇化而现代化,应当合理规划,保留对本土村落实体风格关键元素的继承。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与水平,不仅仅体现村落居民的居住条件水平,还会影响村落经济、产业发展的扩张能力。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传统建筑物保留比重和传统街巷保留比以及新建房屋中混凝土构造为主的建筑物比例共同刻画村落实体的恢复水平,用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占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当地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其间接反应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程度。

村落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为村落发展提供资源。对自然环境的评估既要评估其现在恢复水平,也要评估环保力度。我们选择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测度当地对环保的重视程度。然后,参考《国家统计年鉴》中关于环境部分的指标设计,从垃圾处理、水资源、森林资源、空气质量、噪音水平几个维度设置指标,最终考虑到村落所在环境中水资源本身特点具有不确定性,噪音监控数据的获取存在技术难度,且具有阶段性,故舍弃这两部分的指标,最终保留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森林面积覆盖率、空气质量达到好于二级的天数比和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四个指标。

经济恢复水平的评价指标主要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对村落系统经济本身的带动作用两个角度出发。对于前者我们选择了人均 GDP 增长率、单位 GDP 能耗增长率来刻画,其中单位 GDP 能耗增长率为逆向指标。对于后者,我们选择了和就地就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三个指标。当地自主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和当地自主产业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共同刻画当地自主产业发展水平。
$$\text{就地就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 = \frac{\text{村落户籍人口中就地就业人数}}{\text{村落户籍人口中总从业人数}}$$

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有意识的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为了便于对社会组织恢复水平进行评估,我们将社会组织大致归为政治型组织、管理与服务型组织及其他类型社会组织。对于政治性组织的恢复水平,我们选择了在村落里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政治行为——选举所对应的组织为评估对象。公共管理机构完善度、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三个指标共同承担对管理和服务型组织的评价任务。其中,针对公共管理机构完善度,我们预设的是村落公共管理机构所能完成的职能类型数量占村落所需的公共管理职能类型总量的比例,但具体的评估需要相关方面的专家进行鉴定。同时,设置公共管理机构工作满意度作为备用的替换指标。其他类型社会组织,诸如教育类、文化类等类型组织,选用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比重来衡量。

村落文化不仅包括村落传统文化,还包括随着城镇化过程中与外部系统交流所流入的外来文化。村落复兴,文化水平当同步发展,但绝对不是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在制定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时,我们不仅要重视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还要重视村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针对村落文化

整体水平的评估我们选用了静态和动态两个指标,即文化机构覆盖率和文化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村落传统文化的评价我们选用了重要传统节日保留率、重要生活习俗保留度和从事传统文化产业人数占文化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三个指标分别从节日、生活方式和产业三个角度进行刻画。

如表 1 所示,所有的指标与其对应的权重共同完成对村落复兴水平的评估,用 L 表示村落复兴水平,则

$$L = U_i V_i \quad (i = 1, 2, 3, \dots, 28)$$

表 1 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分类	具体指标(指标 U_i , 权重 V_i)
人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u_1
	流动人口增长率 u_2
	常住人口性别比 u_3
	常住人口 20~60 岁人口占比 u_4
村落实体	传统建筑物保留比重 u_5
	传统街巷保留比重 u_6
	新建房屋中混凝土为主材料建筑比例 u_7
	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占村落 GDP 比重 u_8
自然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村落 GDP 比重 u_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u_{10}
	森林面积覆盖率 u_{11}
	空气质量达到好于二级的天数比 u_{12}
经济	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 u_{13}
	人均 GDP 增长率 u_{14}
	单位 GDP 耗能增长率 u_{15}
	当地自主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u_{16}
社会	当地自主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u_{17}
	当地就地就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 u_{18}
	历届选举人数出席率 u_{19}
	公共管理机构完善度 u_{20}
文化	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占常住人口比例 u_{21}
	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 u_{22}
	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比重 u_{23}
	重要传统节日保留率 u_{24}
	重要习俗保留度 u_{25}
	从事传统文化产业人数占文化产业从业人数比重 u_{26}
	文化机构覆盖率 u_{27}
	文化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 u_{28}

四、结 论

就地城镇化的村落复兴既不是盲目地完全复制旧村落,也不是一味地为了城镇化而抛弃村落本土文化的发展,而是城镇化与村落系统本身特色相互碰撞、协调,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融合,共同完成对村落系统的修复和村落功能结构的完善。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对传统村落的环境保护,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创业就业条件,引导村落居民回流,及时抢救濒临流散的文化遗产,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以维持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结合就地城镇化理论,建立了村落复兴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村落复兴提供了方向参考。但是,由于资料与实践的局限性,部分指标仅来自于理论推理,数据获取难度较大,需要进一步的实践经验或进入当地村落进行调查和研究。希望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够获得更具体

的实践资料,将指标继续精确化,确定具体的计量方法,以达到实际计量为实践提供依据和指导方向的目标,提高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我国农村古村落量大且特色各异,它们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发展演变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套评价指标仅提供方向参考,但不能“指标化”,在传统村落复兴过程中应努力做到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目标与对策相结合,人与自然相结合。

参考文献:

- [1]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 民间文化论坛, 2013(1):7-12.
- [2] 李培林. 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J]. 传承, 2012(15):84-85.
- [3] 渠岩. “归去来兮”——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许村计划”[J]. 建筑学报, 2013(12):22-26.
- [4] 徐晶. 村落不再,暮年何在[D]. 上海:上海大学, 2013.
- [5] 战永祥,王超颖.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关于历史村落的乡愁萦思——以增城市新塘镇西洲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3—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4:9.
- [6] 孙永龙,王生鹏. 民族村落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开发利用[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3):375-377.
- [7] 焦晓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困境、重点与对策探析——“城市病”治理的另一种思路[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1):108-115.
- [8] 祁新华,朱宇,周燕萍.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1):25-30.
- [9] 周鹏,王卫琴. 就地城镇化研究综述[J]. 中国市场, 2015(17):197-198.
- [10] 李国珍,张应良. 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重庆市 G 村的调查[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72-79+190.
- [11] CAIRNS J.Jr. Restoration ecology.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1995,3:223-235.
- [12] HOBBS R J, NORTON D A.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storation ecology[J]. Restoration Ecology, 1996,4(2):93-110.
- [13] 徐文梅,赵海鹰. 恢复生态学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J]. 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2):70-73.
- [14] 任宪友. 生态恢复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05(5):85-89.
- [15] 任海,彭少麟,陆宏芳.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恢复生态学[J]. 生态学报, 2004(8):1760-1768.
- [16] 冯淑华. 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演化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 [17] 宁曦,朱霞. “生态恢复”理论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复兴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 小城镇与农村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4:1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jbjb.swu.edu.cn>